

何世禮身份認同的心結

• 鄭宏泰、黃紹倫

引言

每談到香港華人(甚至是海外華人)的身份認同(identity)問題時,很多人總會以「糾纏混雜」、「模稜兩可」來形容^①,指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搖擺不定、時東時西。有學者這樣形容:「他們有時候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有時候又認為是香港人」^②,甚至會產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糾纏不清、相互剝削」的混淆狀態^③,顯示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實在既非鐵板一塊,亦頗有一些矛盾尷尬之處。

每談到香港華人(甚至是海外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時,很多人總會以「糾纏混雜」、「模稜兩可」來形容,顯示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實在既非鐵板一塊,亦頗有一些矛盾尷尬之處。

一 身份認同的塑造與互動

事實上,在探討香港華人身份認同的孕育、塑造或是轉化等問題時,我們一直認為不應片面地從「香港先

進、內地落後」或是「本地多元流行文化興起而內地文化則趨向單一停滯」,因而產生本土身份與中國人身份的差異入手^④,而應從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的差別、「自我認同」與「他者認同」的拉扯,以及內心鬥爭與行為表現的矛盾這三個不同的層面,並從其相互影響的角度入手,才能更全面地理解香港華人身份認同糾纏混雜、流動多變的特質與核心所在^⑤。

主觀條件是指個人感受、立場或認知,客觀條件則是我們與生俱來的一些基本特質;「自我認同」是指個人對某種身份的認定和情感歸屬,「他者認同」則是別人——尤其是主流社會——對「自我認同」的審視與反饋;至於內心鬥爭與行為表現,則是指個人在綜合本身的各種特質、「他者」的各種回應,以及兩者之間的互動,並在反覆計算與思考之後所作出的不同行為模式。

* 本文資料來自“Entrepreneurial Families: The Rong, Gu and Ho Tung Business Dynasties”的研究項目,經費來自大學研究資助局(HKU 7468/05H),謹此致謝。本文初稿曾在2008年6月21日的香港歷史博物館「周末公開講座」中發表,獲得主辦單位的幫助及與會人士的意見,我們十分感謝。為了完成這個研究,鄭志慧博士及袁詠琪小姐曾經給予很大的支援,我們同樣心存感激。

舉例說，有些自少深受儒家文化薰陶的黃皮膚、棕眼睛、黑頭髮炎黃子孫，移居異國之後，由於對國家民族、鄉里宗親仍有濃厚感情的緣故，他們很多時候仍會心存桑梓，縱使僑居國有着種種政治、文化和法律壓力，仍沒法禁制他們「心向中國」的主觀意願。相反，某些僑居外國多年的華人，就算他們聲稱自己屬該國的公民，若未得到該國法律保障，並享有與該國公民同等權利的客觀事實，例如擁有僑居國居留權的身份證或護照，他們一廂情願的認同往往亦顯得毫無意義^⑥。

再深入一點看，他們就算擁有了「合法」的身份，諸如僑居國身份證或護照等客觀條件，但總會因為某些與生俱來的基本條件，而招來僑居國（社會）充滿懷疑的眼光，認為他們與僑居國的主流民族有別，甚至會在明在暗間採取各種措施，將他們排除在外，視作外人，很自然又會令他們既尷尬又矛盾，因而亦容易滋生複雜糾纏的認同情感。也即是說，身份認同的孕育、塑造和轉變，不單要考慮主觀的感受、客觀的條件，亦要注意到「自我」及「他者」的互動，以至於內心及行為上的拉扯等。

當然，我們必須指出，這種身份認同上的糾纏不清，時東時西，很多時只會出現在台、港、澳或海外華人身上。身在中國大陸的（漢）人，顯然較少會有這種感受，因而或者會對前者的行為不甚理解，甚至會覺得他們「不夠愛國、用情不專、得一想二」。

在討論有關香港身份證制度的發展與香港本土身份的建立的專著中，我們曾經概括地作出了系統化的分析，指出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的差

別、「自我認同」與「他者認同」的拉扯這兩大層面的互動與影響，乃本土身份抬頭的關鍵所在^⑦。可惜，我們未能找到一些具代表性的個案，進而探討內心鬥爭與行為表現相互矛盾等問題。何東（詳見另文^⑧）與何世禮父子的人生遭遇，恰恰既能強化前兩個層次的互動，同時又可補充後一個層面的不足，因而更能具體地說明香港華人身份認同上的矛盾混雜與流動多變。

二 何世禮的生平述略

對年輕一代而言，何世禮（英文名原為Robert Ho Tung，後改為Ho Shai Lai）顯然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但對上一代而言，則肯定是一個赫赫有名的重要人物。一般而言，我們會以「香港首富何東的兒子」或「國民黨將軍」這兩個特定詞組來形容何世禮，說明他的來頭與成就。何世禮確是生於大富之家，父親何東及生母張靜蓉雖同屬歐亞混血兒，但一直以華人自居，日常生活與行為舉止均十分華化。1906年，何世禮在港出生時，何東已是一時巨富，在香港以至中國均名聲顯赫，亦極具影響力。

何世禮年幼之時，母親張靜蓉為他聘來前清秀才教導中文。年紀稍長，何世禮入讀拔萃女書院（其時該校亦會取錄少量男生），一年多後再轉到皇仁書院就讀。完成高中課程後，何世禮在1924年初手持吳佩孚及齊燮元等軍閥的推薦信，在母親陪同下北上，計劃報讀位於山西的保定軍校。可是，受戰亂影響，該校關閉，何世禮敗興而返。重返皇仁書院攻讀大學預科期間，在父親的努力下，何

身份認同的孕育、塑造和轉變，不單要考慮主觀的感受、客觀的條件，亦要注意到「自我」及「他者」的互動，以至於內心及行為上的拉扯等。而身在中國大陸的（漢）人，顯然較少會有這種感受。

直到1941年，因美國參戰，使何世禮早年留學美國的經歷與人脈關係受到重視；加上他加入了國民黨，真正獲國民黨接納，使他有了一展所長的機會，令其個人權勢與地位迅速冒升。

世禮獲英國烏烈芝皇家軍事學院 (Royal Military Academy at Woolwich) 取錄，並在1925年踏上了正規軍訓之途。

在英國完成兩年半左右的軍事訓練後，何世禮在張作霖的「名義資助」下，以「中國軍官」的身份轉到法國方丁布魯 (Fontainebleau)，接受進一步的軍事訓練，1930年畢業返港，然後北上，投靠於張學良的軍中，並經歷了「九一八事變」及熱河失守等重大歷史事件。1933年，何世禮在張學良推薦下轉赴美國利雲和夫參謀大學 (General Staff School at Fort Leavenworth)，並在1935年畢業後重返國土，重投東山再起的張學良麾下，參與「剿匪(共)」行動。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何世禮雖然已返港省親，不在現場，但仍因此遭解除軍職，到1938年抗日戰爭迅速蔓延之時才再獲徵召上陣。或者因為背景複雜，何世禮重披戰甲初期，仕途仍然載浮載沉。直到

1941年，一來因美國參戰，使何世禮早年留學美國的經歷與人脈關係受到重視；二來則很可能因為他加入了國民黨，真正獲國民黨接納，因而使他有了一展所長的機會，令其個人權勢與地位迅速冒升起來。

抗戰勝利後，一直在後勤支援並在軍用物資調配方面表現出色的何世禮，獲委任為東北兩個重要港口——秦皇島及葫蘆島——的港口司令，負責調配物資支援國民黨軍隊在東北地區的戰鬥。由於戰事連番失利，國民黨迅速失去了大陸的江山，何世禮跟隨國民黨政府從東北撤往南京，之後轉到華南，然後再退往台灣。他在1950年獲委為駐守日本的代表團團長，曾安排盟軍總部的最高指揮官麥克阿瑟 (Douglas MacArthur) 訪台，並推動了台北政府簽訂《對日和約》。之後，何世禮被調往紐約，擔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轄下的軍事代表，與聯合國內其他常任理事國的

軍事代表周旋，直至1962年1月退役，在國民黨軍中的最高職位為二級上將。

退役後，何世禮返港接掌家族企業，但在打理生意——尤其是經營《工商日報》之餘，仍繼續為國民黨政府獻謀出力，而《工商日報》的立場更是堅定地支持退守台北的國民政府，並在中英兩國有關香港前途問題上草簽了《中英聯合聲明》後，宣布停刊。之後，何世禮逐漸淡出台灣及香港兩地的



何世禮將軍

政治圈子，並於1998年7月26日在港島山頂的何家大宅安祥去世，享年九十二歲。喪禮上，台北政府雖然送來了中華民國的國旗及國民黨的黨旗，作為蓋棺之用，以示表揚，但何家後人最終婉拒當局美意，讓這個叱咤一時的風雲人物安靜樸實地走向另一世界^⑨。

三 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的差異

單從上文有關何世禮的生平簡介中，我們未必可深刻地感受到何世禮身份認同的糾纏混雜和矛盾尷尬之處；至於下文的討論，則希望可以將這種狀態具體地呈現出來，從而解開何世禮身份認同的心結。

雖然生於當時仍屬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歐亞混血家庭，「外貌看似洋人」，加上自少接受西方正規教育，但是何世禮與父親何東一樣，行為舉止、衣着打扮均十分中國化，並堅定地「選擇」了「中國人」的身份，人前人後均表示自己「祖籍」廣東寶安，乃「中國人」。然而，很多時卻會因為本身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之間存在着的差別，而受到其他中國人或外國人的懷疑與否定，認為他並非「中國人」，認同「中國人」的身份乃別有目的、另有所圖^⑩。

我們知道，在混血族群的眼中，獲取社會認同和接納可說是極為重要的事情，何東本身的經歷或許正是最好的證明。由於華人社會一向「重文輕商」，加上受文化及種族本位思想的影響，「貌似洋人」而商業成就卓越的何東一直覺得不受重視，就算是大

做善事，所得到的社會認同和尊敬，似乎頗不對稱。受到這種因素的刺激，當何世禮提出投筆從戎，以另一種形式向社會作出貢獻時，何東不但加反對，反而給予很大支持，並動用本身的人際網絡，替何世禮穿針引線，顯示家族內部很可能亦希望藉此表達其「一片赤誠」，從而爭取社會的認同與接納。

支持何世禮從軍報國的同時，家族內部顯然亦明白到他本身的外貌與血統，實在有別於純種中國人，令其主觀認同條件經常受到社會的挑戰；加上出於當兵的實際需要，何世禮乘1924年初北上報考保定軍校之便，先行取道上海，透過當地的法院「裁定為華籍」，藉法律程序的客觀方法，確立自己「中國人」身份的基本條件，希望藉此減少日後因為「貌似洋人」引來的各種不便和爭拗^⑪。

雖則如此，由於何世禮在香港土生土長，按英國的殖民地法乃英國屬土公民，加上父親乃「香港首富」，又屬大英皇帝冊封的爵士，其「英籍公民」身份的客觀事實，顯然又不能不被挑戰^⑫。或者是明白到個人身份認同的「流動性」及「可變性」，當報考保定軍校敗興而返之後，何東與何世禮確實又想到了「英國人」身份是「另外一種選擇的可能」。於是，透過何東在英國的人脈社會網絡，何世禮獲得了進入英國皇家軍事學院受訓的機會^⑬。

在英國軍校受訓期間，可能由於背景、生活、學習等受到歧視與排擠，年少氣盛的何世禮據說曾經因為認同「中國人」的身份以及反對殖民主義等問題，與當地的同學或英國人常有爭拗，最後做出「當場撕毀英國護

何世禮人前人後均表示自己乃「中國人」。然而，很多時卻會因為主觀與客觀條件的差別，而受到其他中國人或外國人的懷疑，認為他認同「中國人」的身份乃別有目的、另有所圖。

照」的行為^⑭，甚至申請「放棄英國國籍」，並在駐英國的中國大使館申請中國護照^⑮，以行動說明自己認同「中國人」的身份，否定「英國人」的身份。當然，我們同時必須指出，何世禮決定放棄英國國籍之時，其實正是他計劃轉赴法國繼續深造之時；而沒法獲得英國軍方取錄，讓他進入英國的軍官學校繼續受訓，顯然正是他決定放棄英國國籍的重要原因所在。至於與何東素有交情的張作霖慷慨答允給予何世禮「名義資助」，則讓何世禮獲得了「中國軍官」的名銜，因而才獲得了進入法國方丁布魯軍官學校受訓的資格^⑯。

由於血統與外貌的混合的客觀條件，歐亞混血族群確實既可擁有兩個不同種族、民族或國家的身份，但同時又可被這兩個不同種族或民族所排斥、否認，變成了所謂的「邊緣人物」^⑰。至於如何走出本身的「邊緣性」，進入任何一個種族或民族的中心位置，不但要自我衡量不同種族或民族的「排斥程度」，更要計算如何利用各種條件減少損失，為自我爭取最大利益^⑱。

事實上，很多土生土長，並自幼接受西方教育的香港人或者會有這樣的經歷和感受：當他們到中國大陸旅行時，總會覺得自己與內地的同胞有所不同。在內地同胞的眼中，雖然香港人與他們一樣擁有共同的膚色、種族、血緣和文化，同樣屬於炎黃子孫，是中華民族的一員，但行為舉止、思想價值卻千差萬別，有時亦會覺得他們「洋化」、「吃裏爬外」，情況就像何東及何世禮認同自己屬於「中國人」時，往往會受到本地華人投以懷疑眼光一樣。

歐亞混血族群如何走出本身的「邊緣性」，進入任何一個種族或民族的中心位置，不但要自我衡量不同種族或民族的「排斥程度」，更要計算如何利用各種條件減少損失，為自我爭取最大利益。

四 「自我認同」與「他者認同」的拉扯

沿着這個角度，我們不難看到，與其他同年代的香港混血兒或是戰後在港出生的一代香港人一樣，在身份認同的問題上，何世禮顯然正是陷入了「自我認同」與「他者認同」在拉扯過程中所產生的矛盾與尷尬，令他十分困擾。正如我們在探討何東身份認同時提到，一直以「中國人」身份自居的何東，自打破種族藩籬，搬到只許歐洲人士居住的山頂地區定居下來後，曾經在何世禮已屆入學年齡之時，打算將他送到山頂的英童學校就讀，但卻因「血統不純」問題遭到校方的拒絕，令幼小的何世禮首次面對因為身份認同或歐亞混血的問題而被「他者」否定的現實，從而感受到本身客觀條件不被接納，甚至遭人蔑視與排擠的滋味^⑲。

進入皇仁書院讀書後，雖然我們並沒找到何世禮因為「貌似洋人」、認同「中國人」身份而遭排擠的確實資料，但從當時的社會風氣和種族隔閡的情況來看，何世禮在明在暗間遭到歧視的情況，相信仍然無法避免。事實上，從不同的文獻中，我們不難發現，歐亞混血族群一向被貶稱為「鹹蝦燻」、「半唐番」，甚至是難以入耳的「雜種」、「野種」、「打亂種」等等，顯示當時的社會實在不能一視同仁地接納和對待他們^⑳。

正如前述，在香港出生而擁有英國屬土公民身份的何世禮，雖然獲得了英國軍方的取錄，入讀英國軍校，但卻受到政府與同校同學的多方歧視與排擠，令他十分氣憤，最後甚至鬧出「放棄英國國籍」的事件。既然放棄

了英國國籍，一心一意地做「中國人」，何世禮的「中國人」身份是否從此不被挑戰呢？從何世禮完成英、法軍訓返國從軍初期的遭遇來看，情況明顯與預期頗有距離。

由於「貌似洋人」，加上突出的學歷、家庭背景(大富家庭)以及社會背景(香港是英國殖民地)這幾重特殊性，何世禮加入東北軍之初，只能從低做起。這種安排，美其名是為了體驗生活，實質上則顯示他遭遇到「他者」不同程度的冷待與排擠，甚至招來了懷疑的目光，令他一度覺得十分失落，陷入了悲觀失意的尷尬境地，以至曾經想到要脫離東北的軍旅，「打道回府、返港經商」。由於好友甯恩承苦苦相勸，最後何世禮才同意繼續留在東北的軍中^㉔。

在甯恩承的協助下，何世禮與張學良的關係漸趨緊密，軍階亦逐步提升，並在1933年晉升為少校營長。或者是認為自己在英、法受訓時所學未專，又或者是對軍中待遇未盡如意所採取的另類形式表態，何世禮在1933年初日軍正瘋狂侵擾東北之時，選擇出國深造，進入了美國重點軍事參謀大學校，希望透過提升學歷而爭取「他者」或上級的肯定與重用。

在美深造兩年畢業後，何世禮重投失去東北後力圖東山再起的張學良麾下。由於知識與學歷的進一步提升，何世禮的職級亦略有上升，但實際上仍未如理想^㉕。由1935年年中返國，到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前，重投張學良麾下已經接近一年半的何世禮，官職只是上校大隊長而已。從國民黨軍部在「西安事變」後為着「清理」張學良及楊虎城部下而迅速整理出來的兩份機密資料中，我們發

現，這兩位名揚一時的大將軍麾下，團長或以上官階的將領中，鮮有接受現代化西式軍訓的，而且達到大學學歷的也不多，較為普遍的反面來自「軍訓團」、「講習所」或「講武學堂」之類的非正規或半正規軍事學校，有些甚至只是「出生行伍」，目不識丁^㉖。

在那個「人才難得、學歷有價」的年代，像何世禮這樣曾經在英、法、美等西方國家接受過多年正統專業軍事訓練，對現代軍事科技和戰術均擁有深厚知識的軍事人才，可說是當時中國軍隊內極為缺乏的少數精英，應該是炙手可熱、深受器重才對，但何世禮服務東北軍前後已有六個年頭，軍階職位仍未達團長級別的情況，則很難不令人聯想到是「他者」對他那「貌似洋人、生於香港」背景持否定態度的一些蛛絲馬迹。

在那段漫長的抗日戰爭歲月，何世禮雖然沒有因為出身東北軍系統的緣故而被長期「打入冷宮」，最終在1938年獲派上前線，參與大小戰鬥，但據說後來卻因「脾氣」問題與上司張發奎發生衝突，甚至因此拂袖而去。從甯恩承介紹何世禮生平時採用頗為隱晦的用語，甚至若有所指地以「虎落平陽(被犬欺)，受盡生平未有的艱窘」來形容整個事件看來，何世禮混血兒的背景很可能是關鍵所在，顯示「他者」的排擠與蔑視，頗令何世禮耿耿於懷^㉗。

在身份認同的問題上，「虎落平陽」之時，免不了會受到別人的嘲弄和蔑視，就算是飛黃騰達、地位顯赫之後，仍會招來人前人後的閒言閒語。美國參戰抗日之前，由於中、美軍事合作增加，曾經留學英、法、美等國的何世禮顯然暫受重視。或者是為了

像何世禮這樣曾在西方國家接受過正統專業軍事訓練的人才，在當時中國軍隊內極為缺乏，但他服務東北軍六個年頭，軍階職位仍未達團長級別，很難不令人聯想到是「他者」對他那「貌似洋人、生於香港」背景持否定態度。

表示自己的忠貞不二，又或者是為了減少懷疑、增加「他者」對自己的接納和信任，青年時期對三民主義未必完全認同的何世禮，最終在好友鄭彥棻的引薦下，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宣誓效忠中華民國²⁶，顯示其「中國人」的身份最終得到了接納與肯定，因而令其軍中待遇產了巨大的轉變。

五 內心鬥爭與行為表現的不同

由於明白到本身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之間的差異，很容易引起華洋不同「他者」的排擠與否定，歐亞混血的何世禮內心明顯曾經歷了一番痛苦的掙扎與複雜的盤算，並在生活、求學及工作等過程中，深深地體會到英國社會的門禁深嚴，排斥程度遠比華人社會高，因而與父親一樣得出了「行人（華人）頭好過跟鬼（洋人）尾」的結論，最後決定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從某個角度上看，「行人頭好過跟鬼尾」的這種實用性哲學可說是內心鬥爭與理性計算的結果。理由很簡單，在那個時代，由於歐亞混血族群通曉中英雙語，懂得東西文化，在殖民地的華人社會中可以發揮的機會較多，地位亦較高，甚至可以充當華人社會與歐洲人社會溝通的橋樑或代表——即是「行人頭」；若果選擇做「歐洲人」（或英國人），由於他們不被看作同一種族，加上沒有政治後台，很多時只會受到純種歐洲人的歧視，可以發揮的機會反而極為有限，因而只能以歐洲人馬首是瞻，跟從他們出出入入——即是「跟鬼尾」。也即是說，若果選擇

做「中國人」，他們可以佔據華人社會的上層位置；若然選擇做「歐洲人」，他們則只能淪為歐洲人社會的低下層，兩者的出路與結局可謂高下立判、不講自明了。

從選擇以英國屬土公民的「英國人」身份，前往英國皇家軍校受訓，到面對當地社會的諸多排擠、抑壓與蔑視，被當作「次等人」，之後再決定以「中國軍官」身份轉往法國深造時放棄英國國籍，高舉「中國人」身份，何世禮確實應該深深地體會到「行人頭好過跟鬼尾」的滋味，並在這個過程中強化了本身認同「中國人」身份的層次，希望畢業回國後可以立即加入軍隊，實踐個人救國救民的理想。

雖然一心要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但從加入東北軍初期受到冷待，到1941年加入國民黨前的載浮載沉，何世禮嚐到的，相信又是另一種滋味，令他表現得既無奈又困擾。從真正獲得「他者」接納，正式確立其「自己人」身份的角度上看，加入國民黨成為該黨一份子的舉動，既說明何世禮已經歷了多重試探與考驗，亦暗示他從此可以一施所長，讓其才能、學識與人脈網絡得到充分發揮。雖則如此，由於「貌似洋人」，加上家庭背景與出生的問題相對複雜，何世禮很多時仍會受到別人的某種誤解與歧視，令他十分尷尬。

據王鼎鈞的描述，抗日勝利後，何世禮因為後勤支援工作表現出色而獲擢升為秦皇島及葫蘆島的港口司令。駐守這兩個重要港口期間，當何世禮外出巡察民情時，街道上的小孩初初看到他時，會「以貌取人」地說「洋人來了」，躲在大人身後不敢與他相見，把他當作「洋人」，令他感到頗

歐亞混血族群若果選擇做「中國人」，他們可以佔據華人社會的上層位置；若然選擇做「歐洲人」，他們則只能淪為歐洲人社會的低下層，兩者的出路與結局可謂高下立判、不講自明。

不是味兒，而他則會堅持跑到那些誤會他的小孩面前，「總是用中國話鄭重糾正：『我是中國人，不是洋人』」，顯示他在身份認同問題上的執著^⑥。

或者正是自少便因本身的血統與外貌問題而遭到「他者」或明或暗間的嘲弄、誤解與否定，據說何世禮退休返港主持《工商日報》工作時，曾經下令該報不能採用「雜種」、「野種」、「半唐番」等負面詞語來形容混血兒，顯示何世禮的內心深處對自己的出生與背景頗有一些忌諱^⑦。事實上，由於「自我」的認同情感一向得不到「他者」充分的接納、尊重和肯定，反而受到否定與挑戰，何世禮與很多上一代認同「中國人」身份的歐亞族群一樣，十分重視中國的傳統文化，對某些習俗或儀式更要求做到一絲不苟，比很多純種中國人更為重視傳統。

另一方面，為了避免授人話柄，讓人覺得自己時東時西、立場搖擺，何世禮一生的待人和行事，均表現得極為小心謹慎，《工商日報》更一直堅持支持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的立場，嚴厲批評中國共產黨，直至1984年11月停刊。他對國民黨的上層領導表現出極大的服從與忠誠^⑧，似是害怕辛苦經營並一點一滴積累下來的「他者」對自己的信任與接納，會因某些細節出錯而受到沾污或破壞。

由於政治立場的靠攏，何世禮眼中的「中國」，當然是指「中華民國」。退休返港後接掌家族生意之初，何世禮仍十分強調自己的「中國人」身份。但是，自從《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訂而香港回歸已變成不能逆轉的事實，當中外社會均將目光聚焦到香港的本土問題上後，而與何世禮出生入死的

老一代國民黨人又相繼撒手塵寰時，何世禮顯然亦逐漸減少參與台灣的政治事務，並開始強調家族的「土生土長、植根香港」，突顯其「香港人」的本土身份。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何世禮家族內部雖然最終決定結束《工商日報》，但進入1990年代之後，顯然又曾經作出調整，其中又以外甥（胞姐何錦姿與羅文錦所生的兒子）羅德丞與北京政府高層過從最密。與何世禮一樣，羅德丞在1995年曾公開宣布放棄英國國籍，改為申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令英國政府顯得十分緊張，很難不令人聯想到大約七十年前何世禮放棄英國國籍一事。香港回歸前，羅德丞更一度被視為首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熱門人選之一^⑨，可見何世禮與羅德丞等歐亞混血族群，對於新中國的代表政府，已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和立場，其「中國人」的身份，相信亦已注入了新的元素。至於這個「新他者」對歐亞混血人士「自我認同」的看法，則多少可反映在羅德丞仕途的起落跌宕之上。

香港回歸前，何世禮首次以個人名義捐款給東北大學，支持當地教育。回歸翌年，何世禮又重踏相隔近半個世紀的東北土地，懷緬昔日投靠張學良麾下時的情景，並在返港一個月後與世長辭。在何世禮的喪禮上，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均有派代表出席。為了表示對何世禮一生貢獻的讚許與肯定，台灣方面更送來了國民黨黨旗及中華民國國旗，作為蓋棺之用——一種十分崇高的榮譽，但其後人則以「不想引來（特區）政府尷尬」而婉拒了台灣方面的美意^⑩，讓這位一生渴望能真正獲確認其「中國

香港華人與生俱來的主要特質，雖然與中國內地的漢族同胞無異，但若從文化或是思想層面來看，則可說亦是「歐亞混合」的，因而在身份認同上很難避免地呈現出像何世禮般的糾纏混雜情愫。

人」身份，並一度因此而覺得十分困擾的顯赫人物——若果泉下有知——亦很可能會不無感慨地走向另一世界。

六 結語

對一般人而言，身份認同實在並非甚麼大不了的問題，基本上像膚色、性別或種族一樣，是與生俱來的，亦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對於那些擁有不同膚色、屬於不同種族，曾經在外國人統治下生活過，甚至是遊走於不同政治團體的人而言，「自我」所認同的某一種身份，或是扮演的某一角色，並不意味着「他者」同樣能接納，視之如「自己人」。可以這樣說，當「自我認同」與「他者認同」之間出現分歧、客觀條件又與主觀條件並不一致時，誤解與矛盾很多時便會隨之而生，這樣，不但會令「自我」感到尷尬、失落，有時甚至會因此而造成傷害，或是帶來與「他者」的衝突。

我們認為，香港華人與生俱來的主要特質，雖然與中國內地的漢族同胞無異，但若從文化層面或是思想層面來看，則可說亦是「歐亞混合」的——既有傳統中國文化和價值的沉澱，亦有很多地方表現出對西方生活的追求和思想的認可，因而在身份認同上很難避免地呈現出像何世禮般的糾纏混雜情愫，令人感到既困擾又迷惑，同時亦頗為矛盾、尷尬。

事實上，在很多中國內地同胞的眼中，香港華人雖然與他們一樣同屬黃皮膚、棕眼睛、黑頭髮的炎黃子孫，但其生活習慣、行為舉止，以至思想價值等，又明顯混入了很多西方

的元素，因而呈現了很多不可抹煞的差別。香港華人因而會被批評為時東時西、亦東亦西，但又不東不西，甚至被視作是《伊索寓言》中的蝙蝠——當鳥兒打勝仗時，走到鳥兒一邊，把自己當成鳥兒；當走獸打勝仗時，又走到走獸一邊，把自己當成走獸，兩面不討好，裏外不是人。

然而，我們亦必須指出，香港華人亦東亦西的身份，雖然會帶來矛盾與尷尬，但卻提供了一個選擇，如左右逢源的「齊人」，雖有不少煩惱，亦令很多身不由己的人羨慕不已。若能善於利用這種靈活善變的身份，自然亦能促進溝通，為各方爭取利益，減少矛盾。以何世禮為例，若他真的只是一名「純種」中國人，在投考中國軍校失敗後，而又堅持從軍時，多數只能逆來順受地直接加入軍隊，由低做起，當一名缺乏學歷的軍人，與當時軍旅中的大部分軍官一樣。正是因為多了一種選擇，何世禮的軍旅生涯和遭遇才顯得起落跌宕、與眾不同，才能在抗日戰爭後期（或是國民黨敗走台灣之後）被委以重任，當上國民政府與美國政府協調的溝通橋樑，情況多少與香港人在英國統治期間能夠在促進東西貿易及華洋文化交流方面擔當一定角色一樣，既為自己謀取一定的利益，亦為中國走向世界貢獻一己的力量。

亦東亦西的身份，雖然會帶來矛盾與尷尬，但卻提供了一個選擇。正是因為多了一種選擇，何世禮的軍旅生涯和遭遇才顯得起落跌宕、與眾不同，才能在抗日戰爭後期被委以重任，當上國民政府與美國政府協調的溝通橋樑。

註釋

① 吳俊雄：〈尋找香港本土意識〉，《明報月刊》，1998年3月號，頁23-27。

② Gordon Matthews, "Heunggong-yahn: O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Hong Kong Identity”,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9, no. 3 (1997): 3-13.

③ 李小良：〈香港後殖民地論述：回應與觀察〉，《香港文化研究》，1995年第4期，頁72-75。

④ 有關這論點，可參見吳俊雄、張志偉編：《閱讀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2》，修訂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一書，尤其是「潮流與文化身份」及「本土意識」兩部分的討論。

⑤⑦ 鄭宏泰、黃紹倫：《香港身份證透視》（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4）。

⑥ 施達郎：〈八十年代中國人的歸屬心態〉，《信報月刊》，1980年第11期，頁5-9。

⑧ 黃紹倫、鄭宏泰：〈何東身份認同的心結〉，《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9年2月號，頁65-75。

⑨ 鄭宏泰、黃紹倫：《香港將軍：何世禮》（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8）。

⑩⑫ 和森：〈大元帥贊助何東爵士嗎？〉，《嚮導週報》，第39期（1923年9月8日），頁4-5。

⑪ 王培堯：〈華人之光：軍事長才何世禮〉，《中外雜誌》，1999年第1期，頁51-54。

⑬⑭ CO (Colonial Office) 129.509.52820, *Ho Tung R. Cadet*, 6 March 1928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1-63.

⑮ 李科儀、盧遂如：〈何世禮仙遊：何東百億資產解凍〉，《壹週刊》，1998年8月7日，頁62-66。

⑯⑰ *Stewart Lockhart Collection*, Acc 4138/12A/b,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⑱ Everett V. Stonequist, *The Marginal Man: A Study in Personality and Culture Conflict*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1).

⑲ 鄭宏泰、黃紹倫：《香港大老：何東》（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7）。

⑳ 參見CO 129.410.17849, *Peak*

School, 15 May 1914, 361-63；黃紹倫、鄭宏泰：〈何東身份認同的心結〉，頁71。

㉑ Vicky Lee, *Being Eurasian: Memories across Racial Divid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亦可參見何文翔：《香港家族史》（香港：明報出版社，1992），頁1-94。

㉒㉓ 甯恩承：〈何世禮將軍二三事：紀念何世禮將軍逝世周年〉，《傳記文學》（台北），1999年第75卷，第4期，頁36-42。

㉔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雲南省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合編：《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頁92-103。

㉕ 何世禮：〈鄭彥棻其人其事〉，《中外雜誌》，1982年第3期，頁26-28。

㉖ 王鼎鈞：《關山奪路：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三》（台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頁252。

㉗ 何文翔：《香港家族史》，頁6-7。

㉘ 蔡孟堅：〈憶何世禮與我駐日共患難故事〉，《傳記文學》（台北），1999年第74卷，第2期，頁54-58；陳誠著，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冊（台北：國史館，2005），頁476-77。

㉙ 〈羅德丞病逝，曾欲參選特首〉，《太陽報》，2006年12月12日；高繼標：《羅德丞政海浮沉錄》（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07）。

㉚ 有關何世禮辭世的消息與喪禮情況，可參見《星島日報》，1998年7月27日及8月6日、《文匯報》，1998年8月6日及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9 July, 6 August 1998的不同報導。

鄭宏泰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教授

黃紹倫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